

本期话题：访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先生

访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先生

□ 顾晓光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2.10.001

我一直对77、78级的大学生心存特别的钦佩，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那个荒诞年代保持一定清醒的人，相信并能够静观其变那不可预期的未来。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77级的学生、现任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强馆长是我国最早进行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的学者和实践者之一，1994年，正值美国互联网兴起，他去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接受到新的理念和技术，并于1995年发表了《数字图书馆：21世纪大学图书馆的原型——美国“数字图书馆创始”计划简介》，是我国较早跟踪国际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文章。之后，他参与了CALIS的建设工作，并担任管理中心副主任，组织全国高校共同建设以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文献保障体系，开展各个省级文献服务中心和高校数字图书馆基地建设。同时，他也是CASHL管理中心主任，在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提供资源服务的基础上，CASHL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平台”。

在新世纪，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服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互联网普及了公众的信息素养，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有取代图书馆的可能。朱强馆长希望在今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110年馆庆国际会议上，通过“变革与走向：重新定义大学图书馆的未来”的主题探讨，将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价值传递出去。

他曾任IFLA管理委员会委员、信息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委员会委员，多次参加国际会议，有着很高的国际化视野。作为一名信息服务者，他深知信息的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的重要性，而这不仅在我国需要走很长的路，在很多国家同样面临此类问题。

他担任主编的《大学图书馆学报》一直走在推广学术研究的前沿，并在今年成为了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术期刊。他计划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提高作者的稿费，鼓励学者和图书馆员的研究工作。

从筚路蓝缕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到现在珍品荟萃的现代化图书馆，从地安门内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梳妆楼的馆舍到现在作为北大地标“一塔湖图”之一的宏伟建筑，北京大学图书馆经历了110年的岁月，凝聚了几代图书馆人和学人的心血。作为已经在此工作30年的掌门人，朱强馆长说“当年的图书馆，连一台打字机都要作为设备登记，而今，已成为新信息技术设备和系统应用的前沿。这样的变化，不可谓不深刻，确实是不简单。我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虽霜染双鬓，却也欣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世界一流的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任重道远。他希望在退休前完成几项重要设施的建设，让继任者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他认为图书馆更为重要的是馆员的作为，我们应该对工作怀有神圣感、敬畏感和使命感，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朱强馆长曾是我硕士答辩的主席，也是我重新回到北大工作时的面试官之一，他是我人生重要时刻的提携人。当我向他提出采访要求后，他抽出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讲了他的北大情结以及他对北大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未来的看法。在古风古韵的燕园里，书香满溢，静听时光雕刻的过往，窗外微风斜雨，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顾晓光：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您能否谈谈这四年在北大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

朱强：跟现在比较，当时无论从生活条件还是学习条件，都还比较差。那个时候，图书馆的座位非常紧张，大家都想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的门玻璃不止一次被挤破，我印象中就有两次。图书馆6点半开门，大家6点就在门外排队。当时的同学也不算少，因为有工农兵学员，我们77级，半年后还有78级，三届学生在一起，座位太少，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

同学们都非常刻苦，十年没有书读，而且本来没有上大学的希望，突然有了这个机会，都非常珍惜，有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信念。具体到个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对专业课不太感兴趣，利用这段时间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东西。有个同学喜欢看尼采的哲学，甚至把德文原版借来看。总的来说，上课有逃课的现象，但不学习的几乎没有。

拿我来说，我还是认真学习专业的。无论是同外系的基础知识课，还是本系的专业课，我基本上是一课不落地听下来。

顾晓光：是不是很多课和文史哲专业的学生一起上？

朱强：很多课是和别的系同学一起上，比如说中国文学史和中文系同学一起上，中国通史和历史系同学一起上，计算机的课程和计算机系的同学一起上。

图书馆学系是恢复招生，之前有一段时间被撤销，馆、系合并。我们入学后，被告知是专科，大家一听就不高兴了，好不容易考进来，最后还是专科。于是，我们一些同学开会商量，就联合武汉大学给教育部写信，因为当时就我们两家高校有图书馆学专业。接到申诉后，教育部最后同意改成本科。

因为有了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回过头来看，本科教育，甚至是研究生教育，都是打基础的，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搞专业。从幼儿教育到基础教育，再到高等教育，教育本质上是为了人的发展，是针对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培养。高等教育是面对成人的人格、道德、理想、信念、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还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熏陶。

学习图书馆学专业，培养了我们较强的学习能力，

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景





知道如何查找和利用资料，这对我毕业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很有帮助。虽然很多事情没有做过，但我知道怎么通过到图书馆去查找资料来学习别人的做法。所以说，在北大图书馆学系这四年，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

顾晓光：那时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专业课或者老师？

朱强：对专业的课程来说，并不是很满意，觉得老师讲的还是老一套的东西。由于刚经历文革，对那些政治挂帅、突出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比较反感。这也不奇怪，因为文革刚刚结束，包括思想观念、学科本身的发展没有达到学生希望的程度，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课上和老师有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论，课下同学之间也会就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这也与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风气有关系。考试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按照老师所讲的来作答。

印象比较深的比如吴慰慈老师的图书馆学基础、朱天俊老师的中文工具书、邵献图老师的西文工具书、周文骏老师的文献交流引论、赖茂生老师的科技文献检索、沈迪飞老师的图书馆自动化基础等。

顾晓光：您毕业后就直接去北大图书馆了？

朱强：我们那时毕业是统一分配，在临近毕业的时候，系里发了一个调查表，让大家填写毕业后的工作意向，我觉得这样挺好，虽然是分配，但还是征求你的意见。因为我是独子，母亲在老家扬州，我还是希望回到家乡。考虑到可能扬州不一定适合分配，我就希望去离扬州比较近的南京。系里主管分配的书记找我谈话，说江苏有三个学生，但回江苏只有一个名额，你能不能留在北京。如果以后还想调回去，也相对容易一些。我就

这样来到了北大图书馆。现在看，当时对大家的要求还是比较重视的，做工作也比较细。

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召开不久。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图工委），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林任主任，时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庄守经任副主任兼秘书长，秘书处于是就设在北大图书馆，教育部给了几个编制，起初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借调了几位，像肖自力是从《光明日报》社资料室借调来的。我成了秘书处的第一位工作人员，与我一起到秘书处的有武汉大学毕业的张玉川，半年后李晓明也进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副秘书长肖自力的关系也正式转入。

顾晓光：在图工委秘书处工作了多长时间？

朱强：将近8年，一直到1989年中，这段时间的经历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在老庄、老肖（当时我们都还不习惯叫职务）的领导下，图工委秘书处开展了很多的活动，在参与这些活动的组织、调研、筹备、协调的过程中，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能够从一个比较宽的视角和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待一些事情。由于不是立即做具体的图书馆专业工作，做的是全国性的工作，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关注的都是宏观的东西。在处理这些宏观的问题时，锻炼了工作能力。

在秘书处的时候，也有一些困难。秘书处有点半官半民，在推动工作的时候，有时会不太有力，于是有人就建议把它设为教委的一个正式部门。在1987年第三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以后，就酝酿将秘书处放在教委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段时间被借调到教委的职称办公室，帮助起草图书馆方面相关的职称文件等工作。

当时正逢教委机构改革，几个单位合并成立教材与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决定将秘书处并入，设一个图书情报处，肖自力任处长，我任副处长。1988年底，司里让我将工作关系从北大转到教委，我当时感觉并不太适应机关的工作，北大图书馆庄馆长也认为我留在北大更容易解决我个人两地分居的问题。最终北大情结起了作用，我还是愿意在北大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而且还能解决家庭的问题。就这样我还是留在了北大。

那时，教委既有图书情报处，同时继续保留图工委，相当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不久进行了一次机构调整，几个机构合并成立了条件装备司，图书情报处保留。

后来国务院再一次机构改革，教委调整成教育部的时候，进行了机构精简，条件装备司被撤销，相关职能在高教司设立教学条件处来办理，像图工委这种半官半民的机构要求一律取消，高校图书馆界大家都反对取消，所以有关领导采取了变通措施，把它变成了一个专家型的机构，像聘教指委（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一样聘图工委的委员，又将秘书处放到北大，让我来做秘书长。这是后话。

顾晓光：回到北大图书馆以后呢？

朱强：当时馆里搞自动化搞了好多年也没有搞起来，庄馆长希望我到自动化部，任命我做馆长助理兼自动化部主任，这是1989年下半年的时候。1989年初我的妻子就借调来北大，女儿也在北大幼儿园借读，大约在1990年户口也转到北京了。

北大图书馆的自动化起步比较早，1979年就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研究室，初由副馆长潘永祥后由陈源蒸任主任。我那时还在上大学，我们有八个人组成了一个计算机的兴趣小组，多听了一些关于计算机的课程，这也有助于我在后来做自动化的工作。

顾晓光：当时工作的难度在哪里？

朱强：当时自动化部分成两派，一派是希望用PC机实现自动化，一派说既然我们花了几十万买了世界上当时很先进的VAX（Virtual Address eXtension）小型机（注：VAX是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在1970年代

中期开发的指令集架构），为什么不发挥它的作用呢！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调研，征求包括校外专家在内的很多人的意见，多数认为应该应用小型机。虽然IBM的PC机也很先进，但价格并不便宜，而且当时只能单机操作，我就向馆领导建议用VAX机来实现自动化。馆里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主张用PC机的有些人还为此调离了。

顾晓光：看来争议很大。

朱强：是的，那时只要一起开会就吵架。馆里作出决策后，因为大部分人认可和有些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调离，所以气氛开始好转，大家能够比较踏实地开始工作。在开发过程中，不少年轻人从中受益，业务上成长很快，后来有几位都去美国了。花了两年多的时间，1992年，系统开发完成，通过了验收，并获得了学校的科技进步二等奖。但机器已经买了好几年，已经不能支撑整个系统的运转。举例来说，当时它的内存8M，外存912M，处理能力弱，反应慢，但有冰箱那么大。所以，又向学校申请，花200多万买了一台新机器，那时已经可以实现网络化的操作，但是需要有线连接。

实施自动化的后续工作繁重，包括为每本书装磁条、贴条码、计算机编目。编目的时候，先进行英文图书的编目，因为有从美国国会图书馆买来的磁带以及后来的光盘。这段时间PC机的发展很快，中文处理能力较强，可以实现Client/Server结构的操作，我们又买了一些PC机，来处理中文的编目。

1996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率先引进了INNOPAC系统，它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系统。我参加了论证会，除



了我来自图书馆，其他人都来自计算机方面的专家。通过论证会，我发现系统还是国外的比较先进。清华的刘桂林馆长说，引进国外的系统，不仅是引进他们对于业务的处理和技术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系统引进来学习他们的管理理念，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8年，我馆建成了新馆（现在的东楼），那时应用什么样的系统又发生了争论，一派主张引进国外的系统，一派说既然我们辛辛苦苦地开发了自己的系统，还应该继续用下去。最后决定引进国外的系统，当时正好SIRSI公司新推出Unicorn系统，系统架构、数据库底层比INNOPAC先进一些，适应性上要更好一些。

当时Unicorn还没有汉化，而SIRSI急于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就提出和北大合作一起汉化，这样引进变成了一种合作，这也是我们决定引进Unicorn的一个因素。1999年，系统投入使用。至此，北大图书馆才算是完全实现了自动化。

顾晓光：在这期间，您还经历了什么大的事情？

朱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直到九十年代初，教育经费十分缺乏，很多高校图书馆处在一种“砍书刊”的状态中，我们做了全国性的调研，发现情况很严重，就给教委打报告，也写文章，希望做资源共享。1987年，第三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就做了方案，希望在全国建立若干个学科中心，如果某个

些的图书馆组成，每年在外刊订购前都要开会，协调各自的订购品种，尽量减少重复，等到刊后再根据大家的需求，进行影印复制，部分地解决一点短缺的问题。

1993年，国家教委提出要搞“211”工程。本着共建共享、提高效益的理念，工程提出进行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起初有三项：一个是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因为1991年搞了中关村科技网示范工程，它把北大、清华和中科院三家连起来了，所以用CERNET带动并连接211各校的校园网；另一个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CALIS），作为教育科研网的重要应用，实现图书资料的共享；第三个是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系统。CERNET由清华牵头，CALIS由北大牵头，任务交给了图书馆。

我们请了当时图书馆自动化应用程度较高的几个高校的同仁一起做方案，也是争论得一塌糊涂，很长时间没能达成共识。由于1994-1995年间我去美国进修，方案的制订也受到影响，拖了下来。但对我个人来说，当时互联网开始在美国兴起，我在进修期间学习了很多互联网的知识，收获很大，对回来后开展相关的应用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从美国回来后，我接着进行CALIS的相关筹备工作，后被任命为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负责主导了CALIS第一期、第二期工程的建设方案。

2002年，由北大、清华、哈尔滨工大三校的深圳研究生院组成的深圳大学城要建图书馆，向北大提出希

图书馆主机房：网络信息中心



学校的某个学科基础比较好，再给其一定的投入，增强学科的特色，使之不光为本校服务，而且还可以为其他院校服务，这是学习了德国的经验。这个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实现，因为没有电脑和网络，而且还没有钱。

尽管如此，图工委还是尽力做一些实际工作，其中包括外文期刊方面的共享。当时有一个外刊订购协调小组，由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等外刊订购相对多一

望支持一个人去做馆长。经过一番程序和运作，我按借调的方式去深圳大学城任图书馆馆长。2002-2005这三年，我就经常往返北京和深圳，因当时还兼着CALIS管理中心副主任、《大学图书馆学报》主编和图工委的秘书长。

应该说，在深圳大学城图书馆的三年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使我在独立管理一个图书馆方面积累了经验。初到深圳，我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小到

买书买办公用品，大到做经费预算招聘馆员，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为满足三个研究生院的迫切要求，在馆舍还在设计施工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创造条件，借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行政楼一层，开办了临时的图书馆，对师生提供服务。

2005年，深圳大学城图书馆的建设已近尾声，临时图书馆运转正常，根据学校需要，2005年下半年我回到北大任副馆长。与大学城同事们三年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大家结下了深厚友情，要离开确实是依依不舍。当时大学城领导多次真诚挽留我，这次还是北大情结起了作用，最终我还是回到了北大。

顾晓光：您从1977年进入北大已经有30多年了，见证了北大图书馆的发展，请您谈谈在北大图书馆做的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情。

朱强：一是实现图书馆的自动化。当时很不容易，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除了自动化部，各业务部门几乎所有员工没有接触过电脑，要进行各种培训，消除各种阻力，协调各方面关系，等等。前面已说了。

二是新馆的规划设计。我们从1986年开始呼吁学校建设新馆，一直到1996年才开始动工。给学校写报告、调研相关需求和设计任务书等工作，这些主要是我来做的。

顾晓光：当时还是李嘉诚出资建造的。

朱强：大约是1993年，李嘉诚先生来北大访问，被学校安排参观图书馆，当时图书馆由于空间紧张，两个天井都盖了简易房作为学生自习室，空气和光线都不好，总的来说，条件很差。李嘉诚就很感慨，没有想到北大图书馆是这个样子，表示一定帮助北大建一个新的图书馆。后来决定捐助1000万美元。1000万美元实际上并不够，按照捐助协议，应该由政府相应配套，但当时教委也没有钱，只好先就这些钱用，最后学校补了不足的部分。也正是由于经费紧张，新馆的建设就有很多因陋就简，留下了很多遗憾。

顾晓光：现在计划中的新馆进展如何？

朱强：北大图书馆古籍收藏在全国高校中是最多的，但保存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展示的条件。因此几任

馆长都希望能有一个专门的古籍图书馆，也向学校打过报告。后来碰上沙特国王图书馆分馆项目，我们趁机提出与古籍图书馆合而为一，得到了立项。从提出到现在差不多五年，就要动工了。



这个新馆是和沙特合作，其间遇到了很多问题，涉及文化的差异、细节的沟通、拆迁等等。最后的协议是今年二月份温家宝总理去沙特访问时签署的。新馆分两部分，一是沙特国王图书馆北大分馆，相当于阿拉伯文化中心，他们希望有5000平方米的面积。二是北大古籍图书馆，我们这边大约7000平方米，建成后就可以把古籍搬到新馆，除了保藏条件大为改善，还将有类似博物馆那样的展示条件。由于现馆舍建设时留下一些遗憾，功能上不太适应近年来图书馆的发展要求，加之这两年雨水大，目前的古籍库有漏水现象，所以等古籍搬到新馆后，将对现馆舍进行大修改造。如果这两项工程完成，到时馆舍空间和环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善。

顾晓光：请您继续介绍这些年所做的一些工作。

朱强：三是CALIS。刚才说了，一期的方案主要是我来牵头，同时还有其他高校图书馆的五六位同仁，像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杨宗英、清华大学图书馆安树兰等。我们一起将建设方案做出来后，学校比较重视，为了争取尽快实施，当时北大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带着我们跑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1997年教育部同意先成立管理中心，管理中心主任是王义遒，戴龙基和我是副主任。后来我们认为技术力量还需要加强，就调入了陈凌任副主任。

一期还是传统的、以纸本文献为中心实现资源共享，比如先做联合目录，在此基础上进行馆际互借。当时环境下，馆际互借很难通过实物来进行，就转为做文献传递，复印或者扫描以后再传。

一期建成以后，一个共建、共知、共享的理念被大家接受了，也实现了在国外已经实现了好多年的联合编目，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当时范围局限在211高校，一期只有60多所高校，经费也少。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受益面小，实际影响还不够大，很多没有参与的学校就比较有意见，认为这是“富人俱乐部”。



右侧二层楼为1902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二期就扩大了一点，除了211高校本身的范围扩大，有条件的其他高校也可以参与进来。按照政府要求，二期尝试进行了某些项目的有偿服务，这一点不被大家认同。加之技术力量的限制，一些地方、学校在系统的安装、运行、维护上都遇到困难，CALIS又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帮助，所以还是受到局限。

到三期覆盖面就更大了。一方面，系统采用了云技术架构，实现了SaaS服务。另一方面，鉴于经费大大增加，实行了全免费的服务政策。加上普遍设立了省中心，开展了示范馆活动等，吸引大家广泛参与。

顾晓光：今年暑假前，三期验收的情况如何？

朱强：CALIS三期进行了普遍的服务，而且完全是免费的，所以大家评价不错，无论是图书馆用户方面，还是上级组织验收的领导、专家的方面，都觉得CALIS三期比二期进展很大，验收比较顺利。

顾晓光：三期以后的规划是什么？

朱强：三期验收以后，一方面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一方面正在做新的规划。

顾晓光：有没有四期的提法？

朱强：我们在争取。但实际上，一期一期地申请，有

很大的难度。每一期和上一期之间，有一个空当，这个空当很长，二期和三期之间间隔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没有经费，但系统运行必须保障。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只能跟学校借钱。这严格说不符合经费管理规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向教育部呼吁，能不能把CALIS变成正常的经费投入，比如每年投入多少来运行。如果有新的发展，再去申请项目的经费。但这个设想的实现不取决于我们，最终能否实现还未知。

顾晓光：CALIS的这三个时期，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期都是在上一期的基础上甚至是进行跨越式的建设。如果我们提出四期的规划，是不是也有与之前三期不一样的内容？

朱强：这些都是在考虑之中，但目前还不便透露。

顾晓光：这是您之前所做的三件大事。

朱强：是的。我还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够把东楼的改造完成，还有古籍馆能够建起来。这样的话，我对北大图书馆就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了，也给后面工作的同事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顾晓光：请您介绍一下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CASHL）的运行情况。

朱强：CASHL是我的前任戴龙基馆长一手张罗起来的，2004年开始运行，那时我不在馆里，只是参与了



善本阅览室内景

一些讨论。国家提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当时的副部长也是现在的部长袁贵仁主管这部分工作，每年有1500万经费，后又把文科专款（每年200万美元，后来增加到400万美元）合并进来。由于每年经费有保障，建设比较顺利，这和CALIS不太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CALIS也能够每年都有这样的保障。

顾晓光：目前有600家高校成员单位了？

朱强：受益的有600家高校，但享有文科专款的高校只有70家。原来很多，只要有硕士点就可以拿到经费，后来发现这样太分散了，有的高校一年只拿到一两千美元，买不了几本书，后来就收缩，变成了70家。像北大是拿得比较多的，一年有40多万美元。

CASHL的资源和服务体系由17个中心构成：北大和复旦作为全国中心，还有5个区域中心和10个学科中心，提供服务的主要就是这17家。



顾晓光：CASHL现在还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福建社科院图书馆、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机构合作，未来是不是会加强与更多的非高校图书馆系统的合作？这里面有什么困难，比如版权问题？

朱强：是。我们会尽量规避一些版权问题，同时，我们也强调要保护知识产权，在网站上和实际操作中都是这样。

由于有了正常的经费，配备了比较得力的人，包括肖珑、关志英等，做了大量的推广工作，服务效果显著，因而受到用户的欢迎。同时，CASHL也积极地与其他系统图书馆开展合作，扩大资源。也开展一些相关的研究，如向教育部申请了课题，进行资源布局等方面的研究。参与的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还好，比如每个图书馆被指定要买哪些刊，而且不能轻易地断掉，哪怕经费不够，也要贴钱进去，保持它的连续性，另外还买了一些数据库。总体来讲，CASHL的进展比CALIS更顺利一些。我在这方面的投入并不多，只是帮他们出主意。

首先与我们合作的非高校机构是中科院，因为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比较少，所以就比较依赖CASHL。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资源会从它那边获取到，这样互通有无。后来，是社科院加入，还有上海图书馆。上图有很多资源，但利用率不高，和CALIS和CASHL合作后，大大地加强了资源的利用。

顾晓光：上图是比较开放的。

朱强：对。在吴建中馆长领导下，它的服务理念和开放的意识都比较好，所以我们的合作就比较顺利。副馆长陈超、刘炜说，很多以前没有读者借阅的外文资源现在也有人借阅了。

顾晓光：北大图书馆已经是“百年书城”，成绩斐然。每一个北大师生都或多或少受到图书馆的影响，110年的北大图书馆如何来庆祝她的成绩？

朱强：实际上，从前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计划，并不是非要庆祝北大图书馆的110年，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更加促进北大图书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向外界宣传一下，主要是这两方面的考虑。从总的来看，我们没有太多的、很花哨的活动，主要是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我担任的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PRDLA）主席今年到期卸任，在任三年的年度会议一年在复旦大学、一年在南加州大学，最后一年放在北大，将北大图书馆的110年馆庆会议和这个会议合在一起召开，主题是“变革与走向：重新定义大学图书馆的未来”。对图书馆的未来大家都有很多议论，甚至说图书馆将来会灭亡。但从北大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来看，图书馆还是很有价值的，通过这个会议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出去，是很有意义的。

顾晓光：此次会议的预期规模有多大？有哪些重要的来宾？

朱强：参会正式代表人数预计有100多人。上午有一个庆典，校领导和一些受邀的嘉宾以及两个大会主题发言，后面有三段时间的分会场讨论，一共大约有二三十个发言。报告人主要是我们邀请的，少数是征文的作者。国外嘉宾有60-70人，占会议代表约1/3，规格比较高，美国不少大馆的馆长都会来，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国际图联现任主席和哈佛大学副校长。

我们还会办一两个展览，出版征文的论文集，或者把征文放到网上。另外，我们还会推出新版的图书馆主页。

顾晓光：国际会议的主题中用了“重新定义”这个词。我记得十几年前，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刚刚起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这种词汇来描述图书馆的发展，比如还有“机遇与挑战”等。这个“重新定义”和当年的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环境有什么不同？

朱强：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发展的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样的，会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人们认识水平、技术水平、经济水平等限制。起初，人们把数字化当成数字图书馆的重点，把电子化当成数字图书馆的模式。那时由于一些限制，很多人只是进行研究和讨论，实际上没有办法实现。经过多年的实践，数字图书馆的功能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由于技术的进步，现在做不到的未来可以做到，比如移动图书馆的发展。

当初提出的几个Any（注：Anyone、Anytime、



Anywhere），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现在看是可以实现的或者说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但这不是终点，并不一定很便利地做到和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还要有更新的目标。数字图书馆不仅是数字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图书馆界的事情，它涉及上下游及周围方方面面，包括用户自身。现在谈数字图书馆，

它的范围更广，技术的应用更新。以前是有多少数字资源的问题，现在是如何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数字资源的问题。我们面临的任务和要求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要实现泛在化服务，以后要实现智能化服务，新的任务随着发展而产生。

顾晓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动的变革？比如来自像Google、Amazon等互联网的冲击。

朱强：这既有被动的因素，也有主动的因素。一方面，意识到图书馆的使命和价值所在，我们要主动地适应这种需求的变化而发展；另一方面，读者查找资料去Google、百度，这并不是图书馆没有作用，而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图书馆的作用，我们需要加强对用户的宣传。而且，图书馆和Google、百度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甚至是可以合作。百度以前和我们合作过，我们把元数据信息提供给他们；我们与谷歌也合作过，引进的一些国外数据库可以直接通过谷歌搜索并看到全文。

由于百度在查找外文资源方面的不足，很难支撑我们的研究，从这方面看，Google有替代图书馆的潜

在能力。但我们应该看到，高校图书馆馆员也是一种资源，这是Google所不能取代的。只要我们的馆员素质和能力能够不断地提升，服务能够不断地改进，这样我们始终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思进取，不掌握新的技术，不改进我们的技能，不改善我们的服务，很有可能会被取代。

顾晓光：是的。现在的图书馆员已经不仅仅是借借还还的角色了，现在像北大这样的教学研机构已经出现了很多学科馆员，您怎么看北大的学科馆员的发展？

朱强：对比国外的学科馆员，我们做得还不够，但我们也努力地往这个方向去转型，最近这几年我们新进的员工也是着力在这个方向。特别是最近三年，我们比较关注学科馆员，他们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顾晓光：哈佛图书馆要“做一个科研教学不可缺的伙伴、引领者和合作者”，我认为引领者太难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吗？

朱强：图书馆员，特别是学科馆员，他应当有这个能力。研究者，特别是站在学科最前沿的研究者，他本身就是引领者。但他的领域可能非常窄，所以需要有学科馆员参与进来。像张晓林领导的中科院图书馆，他们的学科馆员，或者叫研究型馆员，做学科的趋势分析，每年会给中科院的领导提交学科的进展报告，它对于中科院的战略决策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有引领者的作用，它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细节，而在于宏观的方面。

去年，学校制订十二五规划，需要了解全校的各个学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他们也委托汤森路透、爱思唯尔帮助做一些工作，但这些企业掌握的信息是国外的，而且也不齐全，只针对自己的资源进行分析。我们图书馆咨询部就帮学校进行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既有外文的数据，也有中文的数据，最后做了一个北京大学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

顾晓光：北大图书馆做这样的报告有很大的优势，在国内也是最早做文献计量的机构之一。

朱强：是啊，我们有工具，又有充分的资源，再加上有较高水平的馆员，做这样的工作是可以的。我就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每年都有一份这样的报告。将来，我们

还可以按照学院来做，比如做经济学院的学科竞争力分析报告，但这需要人力和经费的投入，只是一个设想。

顾晓光：针对具体的个体研究者来说，学科馆员需要做什么？

朱强：刚才你提到的“科研教学不可缺的伙伴”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位学者专注某个领域，我们可以针对该领域不断地提供相关资料，他申请课题的时候，申请奖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给他支持，提供所发表论文的被引率、H指数等。我们现在为十二个院系提供学科服务，现在的难处主要是图书馆人员紧张。

顾晓光：现在招聘新人是不是主要侧重在学科馆员？

朱强：不是，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把人都集中到那里去，别的部门也需要人。相对来说，目前我馆学科馆员队伍的学历最高、学科面最广、最年轻。

顾晓光：北京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图书馆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您在去年访问考察了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并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发表了《感受变革 探访未来——美国三所大学图书馆考察报告》。这三所大学图书馆都是世界一流的图书馆，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多做努力？

朱强：我去过很多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从硬件来看，我们不比他们差；从理念说，也不会落后多少，最关键的是在人。但这又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我们的事业心、责任感与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相比，还是有差距。还有一个差距是在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方面，像哈佛或者康奈尔的图书馆员可以为每门课程做一个Guide。学生访问图书馆网页，对于想修什么课、选什么专业，一目了然，可以得到很好的参考。我们的馆员做不到，即使想做也做不了。举个例子，康奈尔新来一个教授，学科馆员就会约他喝咖啡，或者共进午餐，会说，“欢迎来到康奈尔，我是你的学科馆员，如果有什么要求，我很乐意帮助你。”学科馆员并询问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目前从事的研究，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这其中也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不够open。



这种要把工作做到最好的意识我们还很欠缺。这些差距，我认为是最主要的差距。

顾晓光：这是不是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

朱强：肯定有关系。总的来说，我们很多人现在缺乏理想和信念，缺乏对工作的神圣感和敬畏感。

顾晓光：在专业素养上，也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没有图书馆员的准入制度，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做保障。《公共图书馆法》正在制定当中，为什么高校没有参与，感觉像高校不积极一样。

朱强：不是不积极。呼吁制定《图书馆法》，一直是高校最积极。因为文化部是主管图书馆工作的，但他们直接管理的又是公共图书馆，所以在制订《图书馆法》的时候，出发点都是公共图书馆，没有高校图书馆的人来参与，等征询高校图书馆意见的时候，高校图书馆发现很多条款不合适，不光不能促进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反而可能会有限制，因为两种图书馆差异比较大嘛。这样，当然就会提意见了（当时我本人并没有参与），国务院法制办发现原来问题这么多，就搁置了。后来文化部认为既然《图书馆法》很难取得大家的认同，干脆就把其他图书馆放一边，专做《公共图书馆法》。

顾晓光：是的，这样更现实一些。那么现在高校方面是否有诸如《高校图书馆法》的设想？

朱强：我的观点是等《公共图书馆法》实施后再看，看看实际效果怎么样。但就我现在看到的文本，不能寄太大的希望。《公共图书馆法》实施后好的方面，高校图书馆以后可以参照。

顾晓光：您曾经担任过IFLA管理委员会委员，还担任IFLA信息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委员会委员，并多次参加过IFLA的WLIC会议，请您介绍一下IFLA的工作情况。

朱强：张晓林担任IFLA管委会委员期满后，中国图书馆学会希望我竞选，我当时事情比较多，而且去开会牵扯很多的精力，投入很多的财力，我就给当时学会秘书长汤更生说，需要征得学校同意，这样如果竞选成功，出去开会的经费才有保障。无论是学会秘书处，还是我们馆里，都做了一些推荐性的工作，结果还不错，当选了。

在任期间，开会的时候有些郁闷，委员中只有我一个亚洲人，主要的委员都来自欧洲和北美，非洲也有几个，有时对一些事情即使我发表了意见，也很难被重视或采纳。有些会议由于时间就是一两天，但要花很多时间办审批手续、花费较多和自己的时间安排，就没有

去，这样感到很难发挥作用。

但参与IFLA的事务，也使我了解了IFLA的运作过程、工作重点和关注的领域，它对于推动全球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它是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组织，也因为欧美委员最多，自然就会无意识地以欧美为中心。第二次竞选连任管委会委员的时候，我就没有下太多的工夫，再一个就是还有几个亚洲国家也派出代表参与竞选，把票分流了，结果现在亚洲一个委员也没有。

顾晓光：我记得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时任副馆长）第一次竞选IFLA委员的时候，是在泰国IFLA年会期间，我当时也去泰国参加IFLA会议了。我记得由于泰国的一位代表也参与竞选，把亚洲的选票分流了，吴馆长很遗憾地差几票没有当选，而在下一届才当选委员。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馆员参加IFLA的年会，我们通过IFLA与国际图书馆同行的交流中，最需要学习哪些方面？

朱强：我们通过IFLA会议，第一要了解中国以外的图书馆在关注什么；第二是他们为了改善服务、体现价值，做了些什么；第三是我们要宣传自己，让别人也了解我们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这一届赫尔辛基IFLA年会，芬兰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他也是我们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互联网已死，互联网的本意是互联互通，网民可以自由地交流，但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意义了，除了不多



的一些国家外，各国都有审查。另外，free的互联网已经变成private，成为很多公司挣大钱的工具。以目前的社交网站为例，我们登录网站需要注册，需要ID和Password，大量的个人隐私被他们掌控，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危险。这是他的主要观点。

于是，国外一些人已开始发起一个运动，反对对互联网的控制，中国是他们常常提到的国家，美国、英国也被他们批评。在赫尔辛基开会期间我也体验到，芬兰的互联网确实很自由，随时可以上网，没有任何限制，这就让我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顾晓光：IFLA会发布各国的信息报告（IFLA World Report），里面有各有关机构回答本国图书馆及信息机构发展的问题。关于我国情况的有些答复被报告方质疑，并放在问题后做备注，比如在信息自由方面，他们使用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数据来否认答复的正确性。我们认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巧妙一点的方式来回答，不要去否定事实的存在。

朱强：其实就可以实事求是。有些网站就是可以封，比如涉嫌欺诈的网站。我个人认为不能完全自由，需要管理，但要理直气壮地管理。

顾晓光：前一段时间看到北大图书馆主页上的通告：“从10月8日起，图书馆主要阅览室将实行全周无差别开放，提供早8:00-晚10:00的7×14小时服务，不仅延长了服务时间，还新增了闭架借书处等服务点。实行新服务时间后，图书馆每周阅览服务时间大幅增加为98小时，居全国高校图书馆前列。图书馆自习区每周的开放时间也延长至112小时。”如何理解无差别开放？

朱强：原来周一到周五、周六和周日的开放时间和范围有差别，现在取消了差别开放，并非对读者有差别。每年学生双代会（学代会、研代会）都会有一些提案，包括意见或者建议，涉及很多方面。和图书馆有关的提案集中在希望图书馆延长开放时间，还有人提出24小时开放。24小时开放学校就不同意，无论从学生安全还是学校正常作息时间的角度，校方都不提倡。最近有一个学生给校长信箱发信，他特别到周边的学校的图书馆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北大图书馆开放时间最短。我们认真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这牵扯增加人力、财力的问题，但最后还是实现了。

顾晓光：现在开放时间延长，服务时间和美国高校图书馆比也不少了吧？

朱强：不算少了。有人说国外大学图书馆全天24小时开放，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最多是有个别的自习室24小时开放。

顾晓光：高校图书馆公共服务的话题在今年初是业内讨论的一个焦点。您作为首图联盟副主席也就此接受过一些采访，并表达了“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后，将不会对读者设定门槛”。我作为一名北大图书馆的读者来看，以前北大图书馆也并没有排斥校外读者服务，在今年对外宣传提供公共服务后，也并没有感觉出有多大的变化。现在高校图书馆公共服务的细则并没有公布，请问在未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昨天刚刚看到一个新闻，标题是《沪多数高校图书馆不向公众开放 敞开大门只是传说？》。

朱强：你认为高校图书馆应该如何向公众开放？

顾晓光：我觉得维持现在的情况比较好。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逐步开放一部分服务。在公共图书馆无法提供文献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应该进行相关服务，比如需要的资源正好闲置，但也仅限于纸本资源，因为电子资源有与服务商的协议，这牵扯版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同意复旦大学葛剑雄馆长的观点（注：详见本刊2012年第八期）。

朱强：因为你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所以你有这样的理解。但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他们不是这个想法。我已经接待若干次记者的访问，我基本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包括那次联盟成立会议结束后，几个记者采访我，我说，高校图书馆不可能像公共图书馆那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肯定要有限制，而限制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其实，北大馆已经很开放，读者只要提供二代身份证，一天交三元钱，就可以查阅资料。公共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源，你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肯定接待，而且北京很多高校都是这样。还有做得更好的高校，比如南京师范大学，在暑假读者量少的情况下，可以向社会发放300个阅览证，但这是在仙林校区，周围没有什么社区居民，因而实际去的读者不多。

我离开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之前，向深圳市提交报告，希望它既是大学城图书馆，也是深圳科技图书馆，后来被采纳了。为什么要写这个报告，因为如果你单纯是大学城图书馆，市政府不愿意投入经费，由三所大学经费支持就好了。而且我发现深圳的科技文献较少，特别是深圳图书馆在外文资源、科技资源方面比较缺乏，而大学城图书馆合并了深圳科技情报所，科技资源有优势，资源建设的重点也是外文学术资源。既然这方面有优势，就要支撑深圳的经济、科技创新的发展，因为深圳的高科技企业也很多。而且，这样经费和人员也得到了保障。

大学城图书馆有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向市民免费开放，有些市民进来后，只是参观一下就走了，因为大部分资源不是他们所需的，高校图书馆也是这样，只有搞研究的才会进来。

顾晓光：是的，即使像北大图书馆文学区的小说，大多也不是大众小说，所以面向的群体还是比较窄。

朱强：没错。这样来说，完全开放就没有意义。而且，我们的现实条件也不可能那样开放。简单来说，现在学生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可以去食堂吃饭，如果完全开放后，这就不可能了，还有座位有限等因素制约。所以我一再强调，要利用现在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实现网上资源的共享。如果借书，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如果你是首都图书馆的读者，你发现首图没有你要的资源，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将请求发过来，我们将资源传递到首图去，你看完后再还回来。这样我们也规避了风险。如果你直接来借，不还怎么办？学术资源的收集不易。



顾晓光：好像记者发的采访您的稿件与您的观点有些不一样。

朱强：记者误导，而且像允许乞丐进图书馆，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吗？图书馆又不是收容所。我就给倪晓健馆长建议，应该实现北京各图书馆的互联互通，但需要财政的支持。

公共图书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后，国家财政补贴几十个亿，而现在要求我们高校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却并未出台任何政策或措施。这样实际做的话将给高校图书馆带来额外的人力和经费支出，没有相应的投入，开放是做不起来的，勉强做起来也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有人说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都是向社会开放，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至少我去的很多大学图书馆，人家不接待社会人员。像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就不对外开放，有一次我们在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馆员培训班学员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参观，人家不接待。虽然事先联系过了，但中间出了一点差错，人家以私立大学的理由拒绝参观。但美国的公立大学一般会接待公众。

顾晓光：从新闻上看，您是高校图书馆公共服务最积极的倡导者，并表达过“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后，将不会对读者设定门槛”这样的观点。

朱强：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为了公共服务还专门买了二代身份证的验证机，防止身份证造假。我就听说某个高校图书馆曾经发生过古籍被骗的事情，有个读者拿着假的身份证偷走了一本古籍书。

顾晓光：您的77级同班同学利求同在2012年7月《书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学图书馆的严冬——透视哈佛图书馆重组》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哈佛图书馆重组目标锁定为“……图书馆放弃知识管理系统的地位，争取融入互联网的虚拟世界，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有所作为”。您认为这意味着是“虎口夺食”还是“与虎谋皮”呢？哈佛全员聘任，重新来过。我们是紧跟这样的步伐，还是留有鸵鸟心态，反正现在也不错。

朱强：这篇文章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无法对这篇文章进行评论。去年我去哈佛大学时，我就和这次会来参加北大馆庆国际会议并做主题发言的副校长做了面对面的交谈，也了解到了哈佛图书馆此次改革的情况。哈

佛图书馆系统很庞大，过去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的改革相对滞后。很多高校图书馆都已经改革了，有一些创新。相比而言，它虽然也有些变化，但不够，所以下决心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其实，他们一直想改，但是阻力很大。这位副校长原是哈佛商学院信息中心主任（Manager），她对商学院图书馆的改革很成功，所以哈佛就任命她为副校长，由她来主导图书馆的改革。她通过这次改革，增强图书馆系统的合理性，提高运作效率，加强技术的应用。当然，图书馆并不会放弃知识管理系统的地位。

根据我的理解，此次重组主要针对图书馆最上层的机构进行，下面的机构变动不会太大，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是保留。这在哈佛图书馆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但对于我们专业上来讲，并不是剧烈的变动。最准确的信息，应该等她来参加我们馆庆国际会议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

高校图书馆确实需要改革，我回北大图书馆后，也推动了一些改革，包括机构的重组，人员的重新聘任。我们现在两年聘任一次，机构也调整了一些，比如采访和编目合并为资源建设部，纸本资源和电子资源的部门合并在一个办公室，原来CALIS文理中心和CASHL管理中心是两个办公室，现在合并为一个办公室，一套人马，做两方面的工作。

随着业务的发展，读者需求的变化，图书馆本身功能也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这都是必要的，但不是说机构重组就是颠覆性的，它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功能。

顾晓光：现在北大院系的资料室都逐渐地纳入图书馆的分馆体系中，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总分馆体系走向？

朱强：第一步实现共知，总馆和分馆的资源大家都能够相互知道；第二步实现共享，师生可以到外系去借阅资料；第三步实现分馆作为学科中心的职能，我们现在是院系分馆，将来能不能成为学科分馆？像历史系分馆和中古史分馆很多资源是重复的，应当协调资源建设，减少重复。像康奈尔大学，物理分馆和工程分馆都没有了，资料全部数字化了，都可以通过网络查找，理工类学科的纸本资源越来越少了。

顾晓光：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总分馆体系与之有什么不一样？

朱强：北大和哈佛比较像，各个分馆比较独立。哈佛这次重组也基本保障了分馆的独立。还有一种是分馆的馆员是总馆派出去的，叫做派驻制，像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密歇根大学的图书馆都是这种类型。

顾晓光：《中华读书报》8月15日17版《电子阅读影响图书馆生存？》中提到：“2009-2011年，人民大学图书馆两年内购进了10万种图书，其中40%是在两次以下和零借次。副馆长刘春鸿说：10万种图书中，有3万种图书读者没怎么使用过。”这是图书馆自身采访质量的问题，还是整个图书馆界难逃的一种宿命？

朱强：对于纸本书来说，零借次不可避免。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会借鉴读者的推荐、出版社的信用度等因素。对于研究型图书馆来说，收藏图书并不仅是为近期使用的，还起到传承文明的作用。

顾晓光：今年没有读者使用，并不代表明年没有读者使用。

朱强：对啊。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是否被借了来评价馆藏资源的质量，人类一切的文明成果，我们尽量都要把它保存起来，实际上我们做不到，但要力所能及地去做，这是针对纸本资源。面对数字资源，现在有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PDA（Patron-Driven Acquisition，用户驱动的图书馆采访模式）。如果某本书有三位读者点击了，我们就把它买下来。这种做法就没有问题吗？我们现在就能够设想出一些问题。如果有位读者想看这本书，从这里点一次，从那里点一次，或者找个同学帮助点一次，不说三次，就是三十次也没有问题。这位读者也许是需要这本书，也许是一时的兴趣，看看这本书现

在流行，有猎奇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这种问题就不值得讨论。

顾晓光：北大图书馆设有专门的数字应用体验区，还有独立的苹果产品体验区。根据我的使用情况，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认识并了解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产品，馆员很重视读者的体验效果，并发放了问卷。从目前的服务看，效果如何？

朱强：效果不太好。有各种原因，主要是我们提供的服务跟不上，很多应用有待开发，电子书也不多，我们自己的图书馆移动App不够，这需要一个过程，体验是最初的想法。

苹果产品体验区是与苹果公司及其代理商合作，他们根据公司政策，要求放价签，我们不同意，而且我们只同意展示，不能销售，后来新闻界报道了，他们就撤出了。我们自己购置了一些设备，所以现在的体验区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苹果产品里面有很多的应用，很多读者并不知道，我认为应该保留这样一个体验区让大家来使用。

顾晓光：这也是对读者信息素养的一个培育。我在六月份曾经参加过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Summon发现系统的会议，北大图书馆采用了Summon，也是国内最早应用发现系统的图书馆之一。面对几个大公司的发现系统，为什么选择Summon？

朱强：聂华写过文章，她们经过两年左右时间的调研、测试，发现几大系统各有特色，没有一个是完美的。Summon在外文资源的收录上有优势，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要为师生提供便利地利用外文文献的条件。





苹果产品体验区

另外，招标的时候，Summon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价格也相对低一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Summon。

顾晓光：基于Summon系统的未名学术搜索推出后，是与传统的OPAC书刊搜索分别检索。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未名学术搜索的检索框变大了，这是不是就是引领读者去更多地利用未名学术搜索？

朱强：通过未名学术搜索检索更方便。我们的OPAC不好用，我经常给他们提意见，这也是为什么引进Summon的原因。以前还有CALIS开发的联邦检索，但技术过时了，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保留了一段时间后就撤掉了。因为还有一部分读者不适应Summon，所以一下子都撤掉也不合适，所以现在还保留OPAC，过了一段时间，等读者适应后，就把OPAC搜索框变小，也许以后就只剩下未名学术搜索了。

顾晓光：目前看，Summon收录的中文数据库资源不够。

朱强：这也是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也是不能一下子把OPAC去掉的原因。如果将来全部收录我们的资源，那何必保留两个搜索框呢？

顾晓光：作为一名对未名学术搜索不了解的读者来讲，他可能会认为未名学术搜索就能替代OPAC。

朱强：是的，事实上现在基本上可以替代，但还没有做到完全替代。有时，读者只想找纸本书，那么通过OPAC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顾晓光：是的，我的检索习惯是这样。

朱强：所以，这也是再保留一段时间的原因。

顾晓光：说到系统，北大图书馆的移动服务利用书生公司的移动系统，目前的应用效果怎么样？

朱强：应该说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设想的效果，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功能本身还不完备，我是希望以后读者能够通过PC机得到的服务都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实现，这需要一个过程。

顾晓光：新世纪图书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驱动的，大到系统和资源的变化，小到数字化的应用。您如何看待像RFID和24小时自助借还机这样的应用？我以前听您说过不打算在北大图书馆应用RFID，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朱强：是的。第一，RFID不是全能的，并非有了RFID，磁条和条码就一无是处，而且RFID的应用也有一些问题；第二是投入非常大。我是比较早就关注RFID的，当时在深圳大学城的时候就考察过，需不需

要应用RFID，我就讲了这两方面的理由。而且，以后纸本书的收藏会越来越少，你的用处体现在何处？公共图书馆由于读者量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它的效率。

至于自助借还机，用磁条和条码也可以实现自助借还，并不是只有用RFID才可以实现。自助借还机一是花费比较大，二是需要一定的空间，像北师大图书馆新馆自助还书的时候还可以做到自动分拣，这个需要很大的空间。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借书量也是有下降的趋势。

顾晓光：我发现这类应用在高校图书馆很少应用，但在发达地区的公共图书馆越来越普及，这可能与文化部强力推广这样的应用有关系。当然，它会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普及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

朱强：是的，至少会吸引一些公众的好奇心，进而知道图书馆的服务。我不反对此类应用，但我不想用很多的经费放在这方面。

顾晓光：您在2011年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面向泛在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及图书馆对策研究》，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申请的缘由。

朱强：图书馆的终极理想是希望所有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获得想要的任何信息和知识。怎样去实现，现在看到了希望，比如有比较成熟的技术条件，但并非有了技术条件就可以实现，因为这是一个系

统工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泛在信息社会不仅是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泛在化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信息社会泛在化的问题。一方面，信息社会泛在化怎么实现，实现后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我国尚缺乏系统的考虑；另一方面，泛在化的信息社会中，图书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图书馆应当做什么去适应这样的改变，这也是需要去研究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报这个课题的原因。

顾晓光：这个题目很大，很宏观，也很有必要，但难度也很大。

朱强：难度很大，我现在也很头疼，过几天我们还要开会讨论。

顾晓光：有人说人类社会到今天，经历了3M阶段，从肌肉时代（Muscle）到经济时代（Money），再到底现在的思维时代（Mind），而思维时代更加突出信息的重要性，也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现在的国家各方面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信息的竞争，希望您的课题能够得到更高一层决策者的重视。

朱强：这取决于我们最后的成果，如果它有理有据，上面就会重视。

顾晓光：在普遍的情况下，图书馆一般都会受到经费紧张的困扰。如何去平衡读者的需求和有限的经费？

节流容易开源难，北大图书馆在开源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朱强：我们现在经费非常紧张，2007年到现在，经费没有增长，每年都向学校打报告，但都是一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维持。经费不增加实质上就是在减少，因为资源价格在上涨。我们还能够维持，就像你说的，来自于开源。一是40多万美元的文科专款；二是200多万的CASHL专项经费；三是赠书。我们接收的赠书是非常系统的，有些老





教授将他一辈子收集的专业领域的所有资料全部捐到图书馆，这是对馆藏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有些资源可能有钱也很难买到，像一位教授会有本专业领域很多的国内外资料，还包括一些内部资料；四是分摊购买。如果院系想要买某种数据库，或者一大套价格不菲的文献，我们要求分摊经费。如果一个院系提出，我们五五分摊；如果两个院系提出，我们三三分摊。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经费；五是募捐。像今年召开馆庆国际会议，我们就募捐了60万；还有一些主动的捐赠，但不多。我也曾经给全馆的同仁发信，希望他们介绍他们认识的有钱人进行捐助，但目前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主要得到的还是赠书。在设计新版主页的时候，我们会增加一个关于捐赠的专区，会列出捐赠情况，这也算是对于捐赠者的一个感谢和报答。

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很多代图书馆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刚才说到捐赠，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士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还有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有关的人士的捐助，比如司徒雷登和胡适的秘书捐赠的日记等资料，我们也在整理，准备出版。正是由于这些人士的支持，北大图书馆的收藏才越来越丰富，我们也有义务把资源保管好、整理好，为社会提供好的服务。除了为北大的教学科研服务外，为社会服务也是我们的天职。

顾晓光：谢谢您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接受访问，预祝北大图书馆110年馆庆国际会议等活动圆满成功。

（访谈日期：2012-09-25）

注：除“阳光大厅西侧内景”为殷帆拍摄外，其他图片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顾晓光提供